切尔诺贝利事件中苏联政治体制如何影响信息传递---基于”5W”传播/模式分析

吴晨聪, wucc22@mails.tsinghua.edu.cn

摘要：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史诗级的灾难,而苏联作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应该能为全世界交上一份教科书式的核泄漏应急管理方案。但事实却是在核电场爆炸的几天后,苏联官方仍没有重视起本次事件,迟迟没有良好制定对应事件严重性的应急预案,造成这样的结果可以归咎于苏联内部信息传递的环节存在一定问题。本文将透过总结当时苏联政治体制的特点,分析"5W"传播模式中的要素是如何受其影响。研究发现, 当时苏联政治体制表现出的垄断性和腐朽性,是导致苏联官方无法接收到精确且详细情报的根本原因,从而令苏联官方无法对切尔诺贝利事件制定出一份令人满意的应急管理方案。

关键词：切尔诺贝利事件；苏联政治体制；"5W"传播模式；应急管理方案

1. 引言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47秒于乌克兰北部的小城市普里皮亚季中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核泄漏事件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为控制此次事件，苏联政府作出了当下他们认为「最好的」的应急方案，但从现在的角度回看，无论在信息传递、灾难措施及后续处理等方面，当时的应急方案都无疑是一次失败的政治决策。

而对于一场突发公共事件而言，信息的掌握绝对是重中之中，政府官方需要清楚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好的对事件的各种细节进行处理,制定更完善的应急方案。但令人倍感惊愕的是，苏联这个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在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的信息处理理应是要十分得当的，但事实上，当时不仅是群众，就连政府对事件的了解也是在云里雾里，后知后觉，这说明了切尔诺贝利事件中，信息的传递十分模糊,导致政府无法按照实时情况制定良好的应急方案。

在传播学理论中,信息传递具有模式化的特点，而最为基本的信息传递模式为"5W"传播模式。如果把上述情况套用在"5W"传播模式的话,便是最后一个W "With What Effect" 取得了不良好的效果。另外,传播学理论同样指出,国家的政治体制对信息传递系统有着重要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制度对信息传递的途径、限制等也有所不同。而身为世界强国的苏联在政治体制上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其体制又是如何影响切尔诺贝利事件中的信息传递的呢?本文将基于信息传递的"5W"传播模式，从事件发生后苏联政府对内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探索苏联的政治体制是如何对其内部信息传递的"5W"传播模式中的要素产生影响,从而引致切尔诺贝利事件应急管理方案制定的失败。

1. ”5W”传播模式的引入

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在1948年发表了著作《传播在人类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在此文章中, 拉斯韦尔对信息传播的过程、结构及其功能等,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并且提出了"5W"传播模式的基本信息传递模式，其基本构成要素为: 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与上述五大要素相互对应的研究对象分别是: 传播主体 、传播内容 、传播渠道 、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1]](#footnote-1)"5W"传播模式是传播学研究的经典成果之一, 至今，学界仍给予它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部纲领性的力作。

因此,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 我们可以套用"5W"传播模式,通过分析模式中的五个要素,较为清晰的了解本次事件中苏联内部信息传递的完整过程。

其外,在传播学理论也明确指出,信息传播活动会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包括政治制度、经济条件、文化环境等,其中以政治制度的影响力最大。出于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 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内容可能会被限制、传播媒介或许会被控制等等。[[2]](#footnote-2)若套用"5W"传播模式, 因政治体制而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5W"传播模式的前四个W中 ,最后一个W “With What Effect”则会基于前四个的W的改变而有着不同的传播效果。

1. ”5W”传播模式下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的定位

在一次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部门需要立刻针对事件制定应急方案,从而把事故的损失下降到最低[[3]](#footnote-3),而对于一个成熟完善的应急管理方案的制定,时刻掌握准确无误的前线信息是关键[[4]](#footnote-4)。政府官方是应急方案的制定者,因此,关于灾后信息在苏联内部传递的过程,"5W"传播模式的最后一个W必需做到的效果是令苏联官方接收到精确且详细的情报,才能令苏联良好的为本次灾难制定应急预案。

但事实却是,在事发过后, 苏联政府虽有接收到事件的前线消息,不过对消息真伪性和严重性的了解都十分模糊，[[5]](#footnote-5)这造成了苏联没有第一时间重视本次事件，以致于应急方案策划的不完善,事件没有在最早的时候得到初步控制。苏联政府在本次事件的灾后信息传播并没有达到上述的应有效果。

而正如上一小节所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被认为对信息传播活动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下文将会先总结切尔诺贝利事件时期苏联政府的政治体制特点,其后再分析这些特点是如何影响"5W"传播模式的前四个W,从而导致了事件中最后一个W中没有取得突发公共事件中应有的效果。

1. 当时苏联政府政治体制特点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时的苏联无疑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其国家强盛的背后离不开它的政治体系---社会主义制度。自从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就在列宁的领导下走上了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从而拉开建立共产主义的政治序幕,并逐步成为世界的一流强国,而在列宁带领下的苏联内阁也是较为”和平”。[[6]](#footnote-6)但在列宁逝世后，苏联下一任领导人斯大林却没能带领苏联良好的应对国内外异常复杂的形势,于国内，苏联的工业与农业、国家统一计划与经济市场调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于国外, 苏联既承受着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又承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压力。处在这种形势下，苏联的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开始慢慢偏离列宁主义的方向, 苏联”内阁”也进一步表现出把政权集中化的趋势,从而产生了后人所熟知苏联官僚特权阶层。[[7]](#footnote-7)

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是苏联政治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于斯大林时期萌芽，赫鲁晓夫时期进一步发展,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最终在戈尔巴乔夫末期即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开始走向衰亡。虽说这种官僚制从苏联建国后不久就一直伴随苏联,甚至在苏联成为世界顶尖强国后仍旧存在,但实际上这种官僚制的政治体制上存在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垄断性和腐朽性,下文将对这两个苏联官僚制的政治体制特点展开进行讨论。

1. 垄断性

第一个是垄断性。对于内政官员的分级,苏联采用由列宁所提出的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而这种任命式分配工作岗位的制度的确能提升各部门的工作成效和加强党的领导力量,不过在斯大林上位后,他却把这种制度进一步绝对化。在1923年俄共(布)十二大上，斯大林在代表中央作组织报告时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应当表现在把能够理解我们的指示并且能够忠实地执行指示的人安排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8]](#footnote-8)

事实上, 斯大林严重忽视了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的种种弊端,其中最大的危害在于导致了党内的权力错位。在这种制度下,党各级组织的负责人都是由再一上级的组织直接任命产生。这造成各级党组织掌握着各级以下领导机关和的领导干部使用、罢免和调动的权力。同时，各级党组织中的权力又会过分集中于部分领导者手中，形成领导者个人或党委书记高度集权，但苏联的权力运行本该是以“倒金字塔”型呈现，越在上端，意味人数越多，权力越大。然而，由于干部任命制的实行，这种权力关系被倒置成“正金字塔”型，越在上端，人数越少，但权力却越大。[[9]](#footnote-9)

干部的升迁、任用直接由上级领导决定，这使绝多数的干部有“唯上是从”、"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心态,而权力也被牢牢地控制在了绝少数的领导层的手中,这种阶层之间的权力分割,便是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垄断性。

1. 腐朽性

第二个是腐朽性。对于国家的发展活动,苏联官僚特权阶层仅满足于眼前的私人消费,不愿为的各方面的未来发展下功夫。1973年5月，由基里连科牵头的一个工作小组为中央全会准备了一个在苏联推进科技革命的报告，呈送给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却把它搁置下来，直到他去世这份报告才在他的保险箱被发现。究其原因在于当时在西西伯利亚秋明大油田的发现为国家带来了巨额收入，缓解了经济困难。特权阶层不愿为科技革命浪费脑筋。[[10]](#footnote-10)

当时的苏联高层只考虑行为和抗争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至于这种获取利益的行为会对国家造成怎样的长远后果，会不会导致它们赖以得利的体制的最终崩溃,和如何才能令国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这些与他们自身利益无关的事情,他们并不多作考虑。

不愿考虑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對待事情態度散漫,只追求自身利益,导致苏联发展动力的枯竭,便是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腐朽性。

1. 基于”5W” 传播模式分析苏联政治体制如何影响内部信息传递

上一小节中已经对切尔诺贝利事件时期的苏联政治体制特点作了总结,而本小节将基于上文所述的垄断性和腐朽性两个特点,分析它们是如何对"5W"传播模式的前四个W: Who(传播主体)，Says What(传播内容)，In Which Channel(传播渠道)，To Whom(传播受众），产生影响。

1. 苏联政治体制如何影响传播主体

切尔诺贝利事件中苏联的内部信息传递的传播主体是苏联内部各级的领导者。在事故刚发生时,事件的信息并不是直接从核电站一步到位传递到苏联官方高层,而是中间还有许多小的信息传递过程。当天夜里,核电站站长布鲁汉诺夫收到爆炸的信息后,向苏共中央重工业部部长多尔吉赫报告了本次事故,其后, 多尔吉赫再向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报告。

可以看出,这些小的传递过程无一例外的都是由不同级别的领导层作为传播主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便是苏联政治体制中的垄断性,苏联的各层人员都下意识的只会对单一的向自己的所属的上级汇报,少有会告知其他部门。这种只由领导干部作为传播主体的弊端便是信息只掌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这少部分人既便对原信息进行更改或是隐瞒也难以有他人察觉。

1. 苏联政治体制如何影响传播内容

切尔诺贝利事件中苏联的内部信息传递的传播内容是对于事件发生过程和现场状况的描述。无论是事件刚发生,或是事后已成立了“处理切尔诺贝利事件政府临时委员会”,所传递的信息内容都十分模糊,基本都只是基于表面状况且带着各种保留条件的描述, 对于事故的发生时间、发生过程和反应堆状态等的详细情况，各单位的报告都有着不尽相同的描述，或者根本没有在报告中提及。[[11]](#footnote-11)

而正是因为苏联政治体制中的腐朽性,各单位的官员都不想对本起事件负责,没有重视起本次事件,没有花费足够的资源对事件进行调查,导致对于事件的各种情况报告书都只是草草了事,没有精确记录事件的细节,而致于信息传递到莫斯科时没能让莫斯科真正知悉事件的严重程度。

1. 苏联政治体制如何影响传播渠道

切尔诺贝利事件中苏联的内部信息传递的传播渠道是以电报和报告书形式的傳遞信息的通道。不过在“临时委员会”成立之前,苏联一直都没有一个官方的渠道把灾难信息传递到莫斯科。事件发生的几天后,逐渐也有其他与核电场运作有关的机关知晓了事故,比如苏联动力和电力化部,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等,而他们也各自把自己部门对事件的调查上报给莫斯科,不过這些信息對於莫斯科而言是十分混亂的,因為他們來源於不同的部門,內容也大相逕庭,这引致莫斯科反而没有能让莫斯科官方更好了解本次事件。[[12]](#footnote-12)

同样是因为苏联政治体制的腐朽性,苏联的高层一直没有重视公共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对于信息的传递没有一个统一且經過考實的的系统,以致以莫斯科官方在事发后从一堆不同的渠道接收到大量不明真假的信息,影响对真实局势的判断。

1. 苏联政治体制如何影响传播受众

切尔诺贝利事件中苏联的内部信息传递的传播受众也是苏联内部各级的领导者。根据戈尔巴乔夫的一段回忆: “有关这个核电站出事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己是26日清晨，是通过中型机器制造部的专线电话传送的。先报告给雷日科夫，他又通知了我。当天我召集政治局委员，由主管这类问题的多尔吉林作了通报。他宣布这个消息时讲得相当平淡，没有让人想到危险的巨大程度。”。同时，不少苏共中央政治局的高层成员都没有实时收到核电场爆炸的消息，如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和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沃罗特尼科夫分别回忆起他们是在28日和27日才对事件略有耳闻，且也只是知道切尔诺贝利核电场发生了爆炸。[[13]](#footnote-13)

和传播主体一样,受苏联政治体制的垄断性的影响,事故发生的两三天后,接到核电场爆炸事故信息的也只是苏联高层中的少部分人,而这少数人对事件也是抱着不重视的态度,这成为苏联针对切尔诺贝利事件制定应急管理方案的一大阻力。

1. 总结

总上所述,本文借用“5W”传播模式，分析了信息在公共突发事件下的定位，带出政治体制会对“5W”传播模式中的要素产生的影响，其后总结了切尔诺贝利事件时期苏联政治体制的两大特点，分别是垄断性和腐朽性，并得出这两个特点导致在事件发生后，信息传递的主体只有寥寥几个内部领导者，信息内容空虚难以令官方引起重视，传递渠道的不统一，最终引致苏联针对切尔诺贝利事件制定应急管理方案的失败。

1. 拉斯韦尔 H D:《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何道宽译,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5年。 [↑](#footnote-ref-1)
2.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第2版,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 [↑](#footnote-ref-2)
3. 邹逸江: 《国外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现状及经验启示》, 《灾害学》,2008年第1期。 [↑](#footnote-ref-3)
4. 雷蔚真,胡雅婷:《从CNN海地地震报道看信息传递与价值重构》, 《中国记者》, 2010年第1期。 [↑](#footnote-ref-4)
5. [↑](#footnote-ref-5)
6. 程又中: 《苏联模式的形成、僵化及其教训》, 博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 2000年。 [↑](#footnote-ref-6)
7. 科茨D M,韦尔 F:《来自上层的革命 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孟鸣歧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footnote-ref-7)
8. 斯大林: 《斯大林全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第5卷 [↑](#footnote-ref-8)
9. 彭雪莲: 《苏共干部任命制的特征、危害及启示》,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1年第10期 [↑](#footnote-ref-9)
10. 格·阿·阿尔巴托夫: 《苏联政治内幕一知情者的见证》, 徐蔡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年 [↑](#footnote-ref-10)
11. 张菊萍:《苏联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紧急应对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8年。 [↑](#footnote-ref-11)
12. Geist, Political Fallout: The Failur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t Chernobyl, Slavic Review, Vol. 74, No. 1 (Spring2015), pp. 104-126. [↑](#footnote-ref-12)
13.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述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footnote-ref-13)